

# 序

我和朱彦夫有着特殊的情缘。我们是战友，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我们共同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又都在战斗中负伤，有战胜伤残的相似经历，尽管我的伤比彦夫轻。彦夫是沂蒙山的儿子，而战争年代我曾多次在沂蒙老区养伤，是那里的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所以我们又是“老乡”。我对沂蒙这片土地，对沂蒙的父老乡亲，始终怀有深深的眷恋。我在济南军区工作时，听到彦夫很多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事迹，1987年苑月曾专程到沂源县看望他。那时他已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正以坚强的毅力创作他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这部小说

1995年苑月出版。不久，彦夫突发脑血栓，本已残缺的肢体进一步瘫痪。我知道后很担心他是不是还能挺得住，没想到两年后他又把这本传记文学《男儿无悔》奉献给读者。我为此欣慰，更深为感动。彦夫最近来信说，要我为他的这本书作序，我欣然答应。

朱彦夫是个普通战士，普通党员，普通农民，但又有着不平凡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他19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过济南、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在战争的洗礼中懂得了人生的战斗和战斗的人生，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一次与美国王牌军的殊死搏斗中，他和他的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三天三夜颗粒未进，饿了吞棉絮，渴了吃把雪，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疯狂反扑，始终像钉子一样坚守着阵地。最后他们那个高地上的战友全部壮烈牺牲，只剩下彦夫一个人。他遍体是烧伤和弹伤，左眼球被打掉，肠子露出腹外，双腿和双手都冻坏了。获救以后，他整整昏迷了36天，仅大大小小的救治手术就进行了20次，四肢全部被截掉。他这样从死神那里挣脱出来，重新燃起生命之火，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像彦夫这样严重伤残的人民功臣，本来可以在荣誉军人疗养院中安度一生，但他身残志坚，要求回乡务农，选择了一条自食其力的生活道路。他当了15年的村支书，带领乡亲们战天斗地，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把革命先烈为国家、为民族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无私奉献的凛然正气和英雄壮举写出来，为了把一个特残军人自强不息、挑战生命极限的人生历程写出来，他晚年又拿起了笔，开始了写作这一特殊形式的战斗。

我们这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曾目睹和亲历战争的惨烈

与牺牲的悲壮。有多少可亲可爱、朝夕相处的战友，英勇地倒在沙场，消逝于战火硝烟。

青春是美丽的，而她在生命旅程中又是那么短暂。生命是美丽的，而每个人只能拥有一次。战场上如何面对可能骤然到来的生与死的选择，是人生的严峻考验。朱彦夫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然而，在他身上展现的不仅仅是这些。他向人生的种种磨难，包括困苦、挫折、病痛、彷徨、绝望甚至是死亡宣战，向生命极限发起一次次冲击，不仅创造了生命的辉煌，而且获得了超越生命意义的新生，实现了生命的再造，表现了一个在党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特有的生命张力。正如朱彦夫所说，他把生命的能量定格在最壮美的极限深处了。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塑造了保尔·柯察金的光辉形象，鼓舞了无数的革命者义无反顾地走向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道路。在朱彦夫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朱彦夫铮铮铁骨、无怨无悔、笑傲人生的英雄本色，他用生命写成的《男儿无悔》，真实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形象。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人生的感悟，更好地把握生命的真谛。

朱彦夫告诉我，由于他现在身体甚差，这本书可能是他的最后创作了。但他表示，作为一名战士，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泯灭自己始终追求更大胜利的渴望。他认为人生本就不该有什么极限，所有的极限全部跨越之后，也许就会有一片更加崭新的天地。这是极富哲理的人生箴言。我觉得，不管彦夫今后还能不能创作，他高扬着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

对党、对祖国的无比忠诚和热爱，他永远战斗着的人生姿态，他的巨大的人格力量，都将使他的生命更加充实和璀璨。这里，我祝贺《男儿无悔》的出版，也祝愿彦夫的生命之火烧得更旺！

# 序 摇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孔千疮，中国人民为了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兴起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新时代是人民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艰苦创业的时代。新时代要人们为自己的幸福事业付出艰辛，更要求青年一代作出奉献。正在这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翻译出版，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那种为追求崇高的理想而忘我献身的精神、顽强拼搏的斗志、高尚圣洁的情操和残而完美的亮丽人生便成为当代中国青年思想和行动的榜样。接着，“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的出版，再给人们亮出“活着就是为人

民付出”的价值观，更进一步激励中国青年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两部名著在中国兴起“保尔热”的同时，也就悄然地给中国文学增添了一个新的亮点、新的样式——残疾人文学！

“残疾人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形成后，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出版界特别关注残疾人作家的培养和残疾人文学的发展。因此，保尔和“中国保尔”的文学现象一直在中国延伸着——残疾人中不断涌现出被誉为“当代吴运铎”的解青林、王树梁、王志冲、薛范、张海迪、史铁生、史光柱、王占君等一批作家。他们不仅仅以“中国保尔”的形象出现在文坛，而且影响着整个作家群体，教育、鼓舞着当代青年。鉴于残疾人作家所生活的时代和伤残情况的不同，他们在作品中所反映的个人遭遇与奋斗历程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有个共性，即具有自己个性的身世记实。他们写自己残疾的一生或残疾一生中的各个侧面——诸如以超常人的坚强毅力去掐住厄运的喉咙，挑战肉体的疼痛，熨平心灵的创伤，不暴不弃，自强自立，关心现实，升华灵魂，抒发乐观的心绪，高唱生命的强音，涤荡世俗的讪笑，歌颂生活的美好，执著地创作出一篇篇一部部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文学作品，来回答读者人为什么而活和怎样活才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这个极富哲理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故此，他们的文学作品，能释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迸射出一种强大生命的绚丽火花，以启迪躯体健全的人去深省自己的不如，以感召五官正常的人去追求崇高的理想，以体现文学的热量和能量之所在。常有这样的奇迹，由于残疾人作家的作品与人品的一致，他们的一部书或书中的一句格言，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

读者的一生！正是这样，残疾人作家的作品，是自身奋斗的历史写照，“属于人类永恒的道德范畴”，人们怎样去评价它都不为过。这批作品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是人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铸魂丛书”是残疾人作家的自传体文学丛书。这套丛书，将残疾人作家的多部作品如此集中地出版，可说在中国出版史上罕见。此间应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文学”并非“自生”，而是当残疾人中立志于文学创作或初露文学才华的时候，就得到党和政府的精心呵护和亲切关怀，才终于登上文学殿堂的！所以，有位作家从肺腑里喊出了残疾人作家的共同心声：“党啊，是您给我本来一片漆黑的心房点燃一柄红烛！”

“铸魂丛书”的出版问世，无疑为繁荣“残疾人文学”开了个很好的头。中国作家协会和出版界将继续把这一特殊的文学事业推上新的高度！

在“铸魂丛书”出版之际，让我们祝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从这套丛书中找到自己的榜样，以资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致迷失方向，不致误入歧途；祝愿他们在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道路上做一个铮铮铁骨、义无反顾的英勇战士，阔步迈进二十一世纪。

1999年 10月 愿日

## 第一章 摇告别北平

同大多数孩子相比，我记事很晚。这足以说明，我的天资不怎么好。不过仔细想一想，我又高兴起来。因为，我于 1927 年 1 月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日子里，出生在日寇铁蹄下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但是，直到 1945 年 1 月初，中国人开始扬眉吐气的时候，世界才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1927 年 1 月，我家住在北平。差不多每天都有好消息传来：亡国奴终于当到了头，小日本就要完蛋了……

就在这时候，我遇上一件倒霉的事。那天，父亲一大早就出去收“破烂儿”，中午，四弟幼英发烧，母亲抱他看医生，哥哥和姐姐上学去了，家里就只剩下我和三弟幼民。

幼民要我领他出去玩，我当然不能。幼

民五岁了，屋里关不住他。我大他两岁，却只能爬。我便给他讲《狼和七只小羊》，他撅起嘴：“就这一个破故事，老讲，老讲！”

我正无计可施，忽然看见床上扔着两颗电镀铁球，这是邻居的孩子送给幼民的。听哥哥说，这是一种铁床上的什么装饰物。我闪过一个念头：给幼民变个“魔术”！

这个“魔术”虽说不太复杂，却不折不扣是我的“创造”。我将两颗铁球抓到手，趁三弟不注意时，放到大腿下面一颗，然后提着另一颗，在他眼前晃动，并洋洋得意地说：“我吞下铁球，马上就能把它拉出来——请看！”我又一本正经地说：“各位观众先生，请注意，看我表演魔术——吞铁球。”说着，就张开嘴，把铁球放进嘴里。

我含着铁球，马上去大腿下摸起另外一颗。正想说：“请看，拉出来了！”不料，我的舌头刚一动，嘴里的铁球就直奔我的喉咙去了，“咕噜”一下子，就进到我的肚子里。

我目瞪口呆，傻了眼，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吓昏了。幼民却抢过我手里的那颗铁球，欢呼着：“拉出来了！”一溜烟地跑到院子里。

开头，我觉得肚子里非常难受，铁球在沉甸甸地往下坠。但一会儿又觉得什么感觉也没有。不论肚子里的感觉怎么样，我头脑里的念头可始终没变：“完了，我马上就要死了！”泪水从我的眼里涌出来。当我想到再也看不到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弟弟的时候，就哭得更厉害了。

我吞了铁球子，使父亲母亲极度紧张，但又无计可施。正在医学院读书的继文大哥（他是我伯父的长子），也急出了眼泪。他想出一个主意：把韭菜切成足有两寸长，炒熟，让我大

口吞下。他说，这样也许“会把铁球裹下来。”

这天晚上，天渐渐黑下来。全家人早就不作声了。但我听见爸爸没像往常那样一躺下就打起呼噜，妈妈隔一会就坐起来看看我。屋子里挺静，可大院里乘凉的人们正唠得欢，一个个声音那么兴奋、那么高亢……吞下那样的一个铁球子，那样大，那样重！当我想到那些韭菜也许毫无作用的时候，我的眼泪又涌出来了。

日本鬼子就要完蛋了。听院里的人们说啊、笑啊。中国人就要过上好日子了。可是，可是，我却要死了……我使劲忍住，没有哭出声来。我尽量让自己睡着，但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我还有这样一个念头：这回我睡着了，可能就再也不会醒来了。

不过，我还是醒过来了。第二天早上，我最先感觉到的，是一阵“啾啾”的叫声。再就是，眼前——我还没睁开眼睛，就感到一片明亮，头被什么烘烤着。我死了吗？没有。我的心回答了我自己。我一下子睁开眼睛，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啊，是小鸟在大树上欢快地叫着、跳跃着；是明亮温暖的阳光，照到了我的床上。

我还活着，和我“吃”铁球子以前一模一样，而且，这一觉睡得多香啊……

直到这天中午，我仍平安无事，肚子里没有任何异常感觉。忽然，我听见院里有一人兴奋地大声说着什么，还有询问声、议论声。我听不真切，但我知道准又是在谈“时局”了，而且，准又是又有好消息了。

“妈，妈！”我坐到床沿，呼唤起来。母亲吃了一惊，两只手上满是肥皂泡沫，从里屋跑到外屋，赶到我身边：“肚子

疼吗？”我催促母亲说：“妈，快上院里听听去！他们谈什么呢？”母亲松了一口气，用围裙擦着手，开门出去了。

我心焦地等着。母亲很快就推开门，惊喜地对我喊道：“幼忱！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母亲说完，又回转身，上院子去了。

我兴奋极了。我坐在床上，开心地喊道：“好啊！小日本投降了！”

哥哥放学了，一阵风似地跑进来，进门就问母亲：“这回，咱们该回老家去了，是不是？妈妈。”母亲高兴地回答说：“是啊，是啊！”我没听清楚，忙问：“回什么家？”哥哥过来揪住我的耳朵，大声回答说：“老家！故乡！东北！哈尔滨！”

父亲回来了。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喝酒，父亲连过年都一口酒不喝。可是，这次回来，却拎着半瓶子烧酒，还有一大包酱肉。父亲进门来，只说了一句话：“活到今天了。”说着，马上打开纸包，把酱肉送到每个人嘴里。

后来，在饭桌上，父亲一口一口地喝酒，却默不作声。母亲终于忍不住，冲父亲说：“这是干啥，寻思啥呢？”

父亲神情恍惚地说：“是呀，是呀。寻思啥？寻思这些年呗！”

一听父亲说到“这些年”，母亲神色也黯然了。“这些年”，“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远离了故土，流亡到关内。父亲拖着有病的身体，领着全家人，有今几个，没明几个，有上顿，没下顿……

哈尔滨市的人，多数祖籍为山东、河北。我家祖籍也是山东。只是曾祖父一家从山东迁居辽宁的年代，已无从考察。祖

父死得很早。父亲出生在辽宁开原，后来迁居哈尔滨市。

父亲名叫孙弘思，~~1909~~1909年生。由于家中生活贫困，父亲中学毕业后，就到哈尔滨铁路局工作了。父亲从小读书就很努力，到铁路局工作后，每天晚上都上业余学校学习俄文。几年之后，他的俄文学得非常出色，不仅能阅读列夫·托尔斯泰和其他俄国著名作家的原著，还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父亲曾做过中东铁路机务段办事员、译员以及中东铁路商务处副事务主任、事务主任。~~1934~~1934年，父亲 ~~19~~19周岁那年，同母亲结婚。中东铁路归日本人管理之后，父亲任哈尔滨铁路局营业课职员。他后来又学会了英文和日文。

父亲共兄弟三人。我的伯父孙弘毅因病早逝。我的叔父孙弘济生于 ~~1907~~1907年，参加抗日活动后，改名为孙亚明。父亲还有姐妹，姐姐名叫孙弘光；妹妹名叫孙弘慎。

叔父曾就读于哈尔滨第一中学，曾赴日本留学。他参加革命后，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自那时起，多年后，我们才知道他几经辗转，到了陕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长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叔父出走以后，父亲于 ~~1933~~1933年 苑月，第一次被日本人逮捕。日本人逼父亲把叔父“交出来”，父亲已准备死在监狱。这年十月，父亲被放回。~~1934~~1934年 怨月，我已患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父亲听俄国医生说，有一种简便的烤腿（电疗）医疗设备，可以放在家中自己进行治疗。下班后父亲四处寻找这种设备，这又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于是父亲第二次遭到日本人逮捕，被关押在伪警察署（地址为今“东北烈士纪念馆”）。

我父亲两次被捕，在狱中均受到严刑拷打，第二次尤为厉害。父亲在狱中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这次出狱后，他被哈尔滨

铁路局解雇了。不久，父亲便领着全家人离开东北。

就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的这天晚上，在饭桌上，父亲又渐渐高兴起来，并且又讲起哈尔滨。父亲说，哈尔滨是东北一个美丽的大城市，街道两旁树木很多，还有不少街心小花园。到处是尖顶方底的楼房。松花江水清清的，静静地流着。松花江里有个大岛，与江南市区隔江相望。这个大岛有个十分奇妙的名字：“太阳岛”。父亲也讲到哈尔滨的冬天：松花江上冻出两米厚的冰；大雪日日夜夜地下着……不但我们这几个孩子听迷了，母亲也听出神来。父母对哈尔滨的怀念，使我深深地感动。

……这天晚饭后，父亲坐到我身边，说：“幼忱，你都七八岁了，老这么爬哪是个头？想法拄拐杖吧！”我说：“我站不起来呀。”父亲马上说：“准能站起来。你的左腿，全不能用了；可你的右腿还能吃住些劲。两条腿不一样啊！”父亲又思忖着：“我得马上给你做一副拐杖。”

这天晚上，父亲翻起家底来，把家里积存的各种木方子、木棍子全找出来，又从邻居那儿借来了工具，就“吱嘎嘎，吱嘎嘎”、“叮当，叮当”地干起来。这类木工活儿，父亲原本一点也不会干。可这些年，笔杆子一旦耍不成，铁路局的“饭碗”一丢，父亲干其他活的本事却一样一样都学会了。

大约一个半小时的光景，父亲就为我做好了两条拐杖。刚见到拐杖，我也觉得挺新鲜。可当父亲扶我从床上的凉席上站起来，让我拄上拐杖时，我却“哎哟”“哎哟”地叫起来。我的两个胳肢窝都被拐杖硌得生疼，特别当抬起脚，全身都靠拐杖支撑时，更觉得难以忍受。“我不拄这玩艺儿！”我一屁股坐到床上，两条拐杖被我丢到一边。父亲安慰我说：“你看，

拐杖我都给你包上棉花了。你用手使劲支住扶手，胳肢窝就不会硌得那么厉害了。”

父亲又扶起我，我忍住要流出的眼泪，重新拄上双拐。父亲先教我一条拐杖一条拐杖地轮流挪动，后来又教我两条拐杖同时抬起、放下。

我感到不光胳肢窝被硌得生疼，两只手的手心也被拐杖扶手磨得火烧火燎的。顶难受的是那条惟一能用的右腿了。它的肌肉已经萎缩，所以，当双拐同时抬起时，它在支撑全身重量的一刹那间，极其吃力。我的眼泪早已涌出，只是咬住牙，没有哭出声来。父亲却只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腿和拐杖上，根本没有抬头看我，还很高兴地说：“对，对！就这么走，就这么走！”

忽然，一条拐杖顶端在凉席上一滑，“呲溜——”这条拐杖滑出去，我扑倒在床上了。父亲忙扶起我，笑着说：“不怕不怕，再来！”我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要拐杖了，不要拐杖了！”父亲默不作声，等我的哭声停了，他又来扶我，还笑着说：“你走得挺好了。这回小心点，再来！”我一边推开爸爸，一边又“哇”地哭起来：“我不‘再来’了，我不‘再来’了！”

为了不让父亲再来扶我，我开始无尽无休地哭闹起来。母亲见这情景，也啜泣起来，对父亲说：“不愿拄，就别难为他了！”父亲生气了：“那以后怎么办？就这么爬吗？”我边抹眼泪边说：“就爬，就爬！”父亲忽然大吼一声：“以后不许你爬！再来！”

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发过火，我害怕了。于是，我忍住了哭，继续学着用拐杖支撑着走路。看见我又拄起了拐杖，母亲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父亲却满心欢喜，他鼓励我说：“好孩子，咬住牙，走！一步，一步……”

我就这样练着。很快地，委屈、难过还有想抛开拐杖接着爬的念头，都从我心里烟消云散了。

我渐渐高兴起来，以后，我用不着再爬了。我也站起来了，我也能往前走了，能靠自己的力气往前走了。

就这样，我一边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一边对自己说：

“走！一步，一步……”

走！一步，一步，再一步……

白天，当父亲不在我身边时，我还是学着用拐杖走路。手掌上磨出了茧，胳肢窝也被硌得红肿起来，右腿上的肌肉又酸又疼……我仍然一遍一遍地练着。

我一边走，一边学着父亲说话。我大声对自己下命令：“好孩子，咬住牙走，一步，一步……”

几天之后，胳肢窝红肿的地方已渐渐消退，腿上的肌肉也不那么酸疼了。对拐杖，我已渐渐适应。我早已不在床上练了，我在家中的地上练，还走到院子里去练。

邻居们见我拄着拐杖出现在院子里，满心高兴，都说：“这可好多了！”

我家在北平住了这么久，可我哪儿也没去过。我知道北平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非常著名的地方。北平原来叫北京，这里有许多名胜古迹，有许多好玩的地方……但父亲天天出去想法找活儿，好让一家人填饱肚子；母亲从早到晚，侍候我们几个。谁也没功夫领我去玩。有多少次，我望着窗外的大树和天空，只能自己对自己说：“看，这就是北平！北平的树，北平的蓝天，北平的白云……”

现在好了，我能自己拄着拐杖出去了！我要走得远远的，看看北平到底什么样。一个天气阴沉的日子，没有风，但很凉爽。我走出院子，走进胡同。我想靠自己的力气去做一次“旅行”，心里憋足了劲。

但是，刚走出不远，我就觉得右腿支撑不住了。我站下来，让全身重量落到双拐上，只让右脚触到地面，使右腿休息一下，接着再往前走。至于我的左腿——当我架双拐走路时，它一无所用，只能垂悬在那里。我就这样走着、走着，又走不动了；我又歇了一会，再走……可还是没能走出胡同。

正在这时，母亲撵来了。她在家中找不到我，就跑来外面找。她要我回去，我不肯。最后，母亲说她带我出去。她匆忙地跑回家拾掇一下，取了一点零钱，就又出来了。母亲要背我，我说：“走累了歇一会儿，再走。”到我实在走不动时，母亲还是把我背起来了。不光背着我，她还得给我拿着两条拐杖。

我高兴地瞧着大街上的一切。摩电车“哐当”“哐当”响，电线上还不时迸发出蓝色的火花。摩电车有窗、有门，像小房子，还有轱辘，在轨道上跑。公共汽车、小汽车、洋车、自行车，还有行人穿梭往来。

母亲一边背着我往前走，一边说：“该领你出来看看了。要不，以后就看不到了。”我连忙说：“看不到了？啊，我知道了，咱们要回东北了！”母亲默不作声，却叹了一口气。过一会儿说道：“回去也不容易，听说到处都很乱。你爸爸到东北，也得自己去找工作干。你老叔现在也不知在哪儿，不知是死是活……要是找到你老叔就好了。”我只有一个叔父，因此不必去排顺序，我们都习惯地称他为“老叔”。

我搂住母亲的脖子，想着母亲说的话。我一会儿朝大街上看，一会儿朝天上看。天上全是阴云。这也挺有意思，你看现在，像早上，也像晚上，像上午，也像下午。就看你怎么想了。（长大后我仍喜欢阴雨的日子，这大约是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我的想像力更加活跃……）

其实这时正是中午。拐了几个弯，行人渐渐稀少，母亲背着我走进一道大门。进门一看，里边全是郁郁葱葱的大树，一片寂静。母亲告诉我，这是“中山公园”。

母亲放下我，不想再往远处走了。我却不愿在长椅上老坐着，就拄着拐杖沿林阴道走去。

我非常想知道，在林阴道的尽头又有些什么。我走走歇歇、歇歇走走，终于一步也走不动的时候，才听从母亲，坐下来了。

母亲又讲起哈尔滨，讲起外祖母和舅舅们。离开哈尔滨时，外祖母痛哭不止，直问母亲：“还能看见你们吗？还能吗？”母亲哭着，无法回答。

后来，母亲背起我，返身朝我们进来的那个大门走去，却一时找不到大门了。公园里全是高大的树木，只听见鸟儿叫个不停，其他的游人却不见一个。母亲不停地朝前走。大树，一棵接一棵。在开阔地里光线就暗，在大树下光线就更暗了。我只听见母亲的脚步“嚓嚓”响，只听见母亲的喘气声，却老也瞧不见大门。中山公园这么大，母亲背着我，竟然迷了路。

母亲越走越慢，终于背不动我了。我们就又坐下来，歇了很久。

天色越发暗了，傍晚已经来临。当母亲找到大门前时，却发现这道大门已不是我们中午走进来的那道大门了。